

# 新史学

第七卷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本卷主编◎王奇生

中华书局

# 新史学

第七卷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本卷主编◎王奇生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 第7卷, 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王奇生主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  
ISBN 978-7-101-09343-8

I. 新… II. 王… III. ①史学-文集②中国历史-革命史  
-研究-20世纪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2992 号

---

书 名 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  
本卷主编 王奇生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18 插页2 字数28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343-8  
定 价 58.00元

---

## 《新史学》编辑委员会

召集人:孙 江 杨念群 黄兴涛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毛 丹 王奇生 王 笛 朱庆葆 行 龙

刘建辉 吴义雄 李晨光 李 静 余新忠

贺照田 夏明方 黄东兰 麻国庆 龚 隽

章 清 彭 刚 韩东育

学术秘书:胡 恒

# 导言：高山滚石

##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

王奇生

20 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 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 20 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适合。避开革命而探讨 20 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亦因此,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在海外学界曾经备受关注,并产生过一批富有洞见的学术论著。中国更是从毛泽东时代就非常重视革命历史的书写,并将革命史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导的一个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后,革命史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30 多年来,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相关论著的出版已相当可观,内中不乏精深实证的佳作,不过更多的研究仍沿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最近数年来,国内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并形成一股新的革命史研究热。这一轮革命史研究热,明显超逸了传统革命史学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但也不可否认,对现实政治的焦虑与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萦怀,牵动国人对中国革命历程进行重新反思与探究。这意味着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

本辑《新史学》以“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为主题,也可以看做是对新一轮革命史研究热的呼应。按照惯例,主编必须在卷首写上几句话。我也想趁此机会谈谈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一点看法,然而思考再三,却迟迟不敢下笔。作为历

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企图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既想客观平地解读“过去”,又难以完全摆脱现实关怀的干扰。这是我当下思考革命的两难。

## 初始革命的开局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我们有必要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如同一曲戏剧的三个场次。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是一场世纪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这一看法似乎是老生常谈,却仍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某一阶级;二是革命源于对外,是从外引发的,而非内生的。

中共成立伊始即将自己的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对中共来说,这是依据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来确定的。当革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应一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可直接移用为学术论断,但国内主流革命史学界至今沿用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作为革命研究的定论,不容置疑。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的主导力量是一批以海外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来没有表示过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也没有这样的阶级意识。近数年来,国内学界质疑辛亥

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声音渐高<sup>①</sup>。其实，早在1951年，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的梁漱溟先生就不无忧心地指出：“指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指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党，完全不合事实，特别是给外国人和后人看了误解。”<sup>②</sup>

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国民党的领导群体，部分是辛亥知识分子，部分是五四知识分子；而中共的骨干则是清一色的五四知识青年。1926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指出：“党员多集中于城市，且多属于智识阶级。”<sup>③</sup>当时北方舆论也注意到：“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真是风云际会，千载一时！”<sup>④</sup>

中共方面，据李一氓回忆，直到北伐前后，整个中国共产党都还很“学生气”。当时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就连中共中央通告，也不称“同志们”，而称“各级同学们”<sup>⑤</sup>。1927年以后，中共为增强党的工人阶级性，刻意提拔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但很快发现，工人干部的知识与能力，不足以担当领导革命的重任。中共革命最终有赖于一批知识分子的领导才取得胜利。

20世纪中国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极端，由急迫、急

---

① 可参见杨天石：《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61—176页。

② 梁漱溟：《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草稿》（1951年5月），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50—851页。

③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④ 巫：《学生界有幸有不幸》，《现代评论》第5卷第105期，1926年12月11日。

⑤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切,进而急进、激烈。1895年以前,士大夫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还当作一种“慢性病”,1895年之后,知识精英顿时感到“慢性病”转为“急症”,群呼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知识精英阶层的情绪日趋激化。1902年,梁启超有过如下一番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sup>①</sup>

两年之后,梁启超又观察到:“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殫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sup>②</sup>在梁启超看来,学界从“骇变法”到“骇民权”,从“骇民权”到“骇革命”,从“骇革命”到竞谈革命,每一次“升级”的周期均不过一两年。

世风之急变如此,革命成功之迅捷更出乎意外。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感慨:武昌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sup>③</sup>。梁启超也感慨:“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日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诧以为奇……”<sup>④</sup>

对于辛亥革命的“速成”,各方看法不一。杜亚泉担忧:“夫成熟易者果实不良,代价廉者物品必劣。”<sup>⑤</sup>而在胡适看来,革命之速成,恰可证明革命时机的成熟,意味着革命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sup>⑥</sup>。而对于辛亥革命的结果,很快就有人感觉不满足、不彻底,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

①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

②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③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④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载《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168页。

⑤ 高劳(杜亚泉):《革命战争之经过及其失败》,《东方杂志》第10卷第3号,1913年9月1日。

⑥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



辛亥革命只止于辛亥革命，绝不会有比辛亥革命好的结果发生，也决不会有比辛亥革命坏的结果发生。这句话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当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环境上所必需的，所需要的，大多数人民所需要的，就只是“推翻满清”，至于推翻满清以外的事，和推翻满清以后的事，则他们所不问。所以辛亥革命的结果，便只是将满清推翻了；不是没有将满清推翻，也不是会发生出推翻满清以外的好的结果。<sup>①</sup>

这一看法颇堪注意。后来史家习惯于以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来衡量这场革命的成败。孙中山确实有高远的革命目标，甚至有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美好设想，但当时多数革命党人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他们最切实的诉求就是推翻满清。1919年罗家伦即指出：“当时大家对革命的观念，据我所知，实在是很简单的：他们的公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推翻满洲政府—推翻满洲政府中国就会好’。……除了几个领袖人物而外，其余的人……原来就没有民主共和的观念，如何可以盼望他们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呢？”<sup>②</sup>同时期的傅斯年也有相似看法：“回想当年鼓吹革命的人，对于民主政体的真像，实在很少真知灼见，所以能把满洲推倒，一半由于种族上的恶感，一半由于野心家的投机。”<sup>③</sup>孙中山稍后也承认：“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sup>④</sup>

孙中山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说这番话的。以此观之，革命党人对民权、共和的认知尚如此模糊，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就不足为怪。即使革命党人群起反对袁世凯称帝，也未必意味着“共和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反专制者未必真知民权，反帝制者未必真知共和。1918年高一涵将辛亥革命与法国革命、美国

① 徐天一：《今日之革命与革命者》，民智书局，1928年，第21—22页。

②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

③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5月。

④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85页。

革命比较,注意到各国革命过程中思想启蒙之差异:“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sup>①</sup>

高一涵的这一看法也值得我们重视。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非常重视思想舆论的宣传工作。革命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革命党人的社会动员。但革命党人的动员策略,主要集中于“排满”宣传<sup>②</sup>。当时革命派专从满、汉的恶感方面鼓吹,煽动民族仇恨,激发民族感情,非常具有社会动员力。胡汉民后来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其一是策反新军,其二是排满宣传<sup>③</sup>。革命党人一意鼓吹“排满”,“三民”实际简化为“一民”(民族/种族),民权的宣传不受重视,民生主义更少人闻问。

“排满”压倒一切,既是革命速成的经验,也是共和无果的教训。不过,共和虽然无果,推翻帝制的意义却不容轻怠。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这场革命在社会底层的反响只是死水微澜,而胡适则注意到这场革命对知识精英心态的巨大冲击以及对社会上层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1934年“双十节”之际,胡适曾专门撰文,对辛亥革命做了一番回顾与总结。他拿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认为日本自九世纪以来,一千余年中,天皇一直没有实权,无权可以作恶,而掌握实权的幕府则成为万恶所归,所以才会出现尊王倒幕和拥护君主立宪的局面。中国则不然,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一切罪恶也都归到皇帝和帝制,所以中国革命不能不推翻帝制。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胡适特别指出,“帝制的推翻,虽然好像是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他尤其强调辛亥革命在思想和社会层面所带来的“大解放”：“帝制倒了,在

①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② 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③ 《胡汉民先生自传》,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影印本,第237—238页。

积极方面虽然没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在破坏的方面确是有了绝大的成绩。……这多方面的崩溃，造成了一个大解放的空气。这个大解放的空气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义。”他列举了很多“大解放”的业绩，包括妇女解放、礼教革命、法律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在他看来均是辛亥革命的遗产。“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能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所以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后来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sup>①</sup>

时隔5年之后，身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在纽约世博会发表演讲，再次阐述这场革命对中国人思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意义。他特别指出，无论在当时，还是随后的许多年里，辛亥革命的意义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世界只见到辛亥革命之后那些满是国内冲突与内战的年岁。他们却未发现，在无序与分裂的表象之下，巨大的变迁正在发生。他再次强调推翻帝制是极具革命性的，“能有什么比经过几千年时间检验的帝制更有力量，也更具持久性呢？如果皇帝都能被时代的洪流扫除，那就绝无其他貌似神圣的东西能在新思潮及其实践的冲击下岿然不动”。他说，辛亥之后，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批判的。三皇五帝、孔子与儒教、佛教、道教、家庭、婚姻、孝道、神灵、长生不老，没有一样能逃过刨根问底式的批判与质疑。“绝对王权的垮台为思想自由和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先决条件。民国治下的二十八年，是中华民族思想史和社会史上重要的一笔。这些年里，彻底而又根本的现代化进程席卷中国，几乎影响了国人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为见证者同时也是投身变革中的一员，我可证明，若脱离了二十八年前的辛亥革命，这些变革，这些思想与社会运动将是不可想象的”<sup>②</sup>。

一贯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胡适，竟如此高调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令人感到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与后来胡适的看法颇有几分相似：“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

<sup>①</sup>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

<sup>②</sup> 胡适：《双十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October Tenth》（1939年10月10日于纽约世博会），崔隽译，<http://www.douban.com/note/175574677/>。

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sup>①</sup>也许可以说,正是辛亥革命孕育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和斗争意识。

后来的史家已经很难体察到辛亥革命在国人社会心理层面的潜在影响。虽然清廷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但“那七百年理学余威还在那里支持一个尊君的局面,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不敢作进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sup>②</sup>。直到辛亥推翻帝制,才使一切去神圣化、去权威化,一切不再存敬畏之心,亦如梁启超所预料的,革命之后,再无“骇”。几千年的帝制可以推翻,还有什么不能颠覆?现实中的皇帝可以逊位,读书人心中的皇帝(孔圣人)何足敬?一国之帝可以不忠,一家一族之帝(族长)何足孝?一国之帝可以打倒,一省之帝(军阀)、一乡之帝(土豪劣绅)何足畏?胡适不同意陈独秀以“德、赛两先生”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应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sup>③</sup>。而这恰是辛亥革命之后历史演进的逻辑结果。胡适正是从这一重意义上认定辛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国民革命,均是辛亥革命的自然产物。

## 再起革命之多元竞争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自然志得意满,而立宪派则难免垂头丧气;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受歌颂,立宪派则大江东去,任人嘲笑;革命党人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灿烂光辉的事迹,立

①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89—390页。

②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22号,1934年10月14日。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宪派则深恐他人旧事重提，甚至自此隐姓埋名<sup>①</sup>。如果说两派之前的激烈论战尚难分胜负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则给时人留下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而革命的速成，更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的错觉，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sup>②</sup>。

革命之后的妥协，有走向民主宪政的可能，然而竞争的双方不能建立共信，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一遇对抗即诉诸暴力。在野的一方再起革命，在朝的一方武力镇压，均希望以暴力压倒对方。1913年当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时，梁启超即发表感想说：“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sup>③</sup>。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革命复产革命”意味着革命具有繁衍性和递进性。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一度给社会留下一些负面的印象，舆论也不乏厌倦革命的声音，然而，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不仅是革命党人，甚至整个知识界，都或深或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再起革命”运动。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勱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其时各派对革命的态度不外两途：一种视革命为神圣、为神明，对之顶礼膜拜；另一种则视革命可暂不可久，可偶不可常，是手

<sup>①</sup> 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sup>②</sup> 罗志田先生指出，“对于很多未曾认识到此次鼎革性质的人来说，革命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就‘成功’，后面诸事也都应同样顺利而神速才是。或许正是革命成果来之太易，宠坏了早已被近代连续的挫折逼得急不可耐的国人。”见氏著：《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载余英时等著：《不确定的遗产》，第67页。

<sup>③</sup>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

段而非终极目的<sup>①</sup>。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地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的失道,比清廷更有过之。立宪派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如今则是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中国所谓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sup>②</sup>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革命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早在20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并形成相当的声势,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转入群众动员,其革命活动达到全盛。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组织,全国各地一度出现过90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和70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工会,率先发起现代工人运动,也最早将革命引向农村,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到民间去”。中国早期共产主义一度与无政府主义难分彼此。一批早期中共党员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化而来。在中共成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是中国唯一坚决主张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革命的组织。在同时代人眼里,无政府主义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竞争者,直到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比信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多。反对强

<sup>①</sup> 余国良:《五四知识群体的革命论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11月。

<sup>②</sup> 《不可测》(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10日。

权、反对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败给了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和竞争，但不能因此而轻忽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席之地<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1921)、中国青年党(1923)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1924)的改组几乎是同时的。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后，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应该说，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由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组合而成的运动。国共两党之外，无政府主义派、中国青年党，乃至1927年后的第三党、中共党内的托派、国民党内的改组派等，均是那一时代中国革命系谱中的一环。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以革命为诉求的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惟己独“革”，惟己最“革”，惟己真“革”，视革命的同路人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同时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党派之上。“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反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强调“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水火不容。与清末相比，1920年代的“革命”话语既带有浓烈的专断性，又富有浓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础上开始凝固成一种新的“革命”政治文化<sup>②</sup>。

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主要目标，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将

<sup>①</sup>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做过严谨的史实重建和精彩的学理分析，见氏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sup>②</sup> 参见拙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三、四章。

革命重心放在发动以工农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方面。国民党重视武装斗争,不重视群众运动,共产党则适得其反,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中心。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存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三四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存,两党党争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直至最终破裂。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形式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了它的预定革命目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没有建立职业革命武装,主要依靠联络会党和策反新军,最后武昌起义一举获胜,类似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一种典型的暴动型革命;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改变策略,首先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并通过黄埔军校建立职业革命武装,时机成熟后举兵北伐,最后统一全国,属于根据地型革命。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将精力集中于群众运动,也试图选择时机发动群众暴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就是暴动型革命模式。然而因为不重视军事,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武装,最终受到国民党的武力打压而失败。1927年后,中共在城市暴动一再受挫后,才走上农村根据地型革命之路<sup>①</sup>。

## 激进革命之不断推进

1920年代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年代。后来革命的一些基本特质,在这一时期

---

<sup>①</sup> 一般而言,暴动型革命适合于城市,根据地型革命适合于农村。城市很难作为长久的革命根据地。城市的一切运转,均依赖与外界的流通,一旦被包围就很难维持长久。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广州政府切断广州与香港的流通,香港立即成为“死港”、“臭港”;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介石切断上海与汉口的金融与商业流通,汉口就难以为继。相对而言,农村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可以自给自足。即使是井冈山这样贫瘠的山区,蒋介石的前几次“围剿”都没有成功。



初步奠定。除了中国自身的“革命土壤”外，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更准确地说，厌弃资本主义与向慕社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

据张东荪观察：“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sup>①</sup>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建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系统的危机，促使五四知识分子厌弃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转向“互助协同”的社会主义。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无人敢言社会主义的坏处而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周佛海即注意到，当时出版物上看不到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的文章，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sup>②</sup>。稍后更有舆论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sup>③</sup>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受到中国知识界的一致厌弃。梁漱溟即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sup>④</sup>即使不赞成“共产”的梁启超也明确表示反对资本主义<sup>⑤</sup>。“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从此在中国声名狼藉。稍后国民党人也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sup>⑥</sup>。

① 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期，1919年12月。

② 周佛海：《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

③ 袁同畴：《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6年12月5日。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⑤ 梁启超1927年5月5日写给其子女的私信：“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0—1131页。

⑥ 陈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分别见《向导》第71期、第190期，1924年6月18日、1927年3月6日。